

◎刘淑玲 著

大公报

与中国现代文学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刘淑玲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11
ISBN 7-5434-5663-X

I. 大… II. 刘… III. ①大公报-研究②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G219.296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1316 号

书 名 《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

责任编辑 杨 才

装帧设计 牛亚勋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制版印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北二环西路 201 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663-X/G·3720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0311—8641271,8641274

邮购地址:050061,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邮购电话:0311—7731224 E-mail:wfbbooksell@vip.163.com

一个自由而独特的文学空间

——序刘淑玲著《〈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

孙玉石

萧乾先生说：“以刊登创作为主的文学副刊，是中国在世界新闻史上一个独有的特色。”坚持20年之久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就是这样“独有的特色”的一个典型代表。以往研究中，论及京派文学现象与作家，或三四十年代文学的时候，才会提及、涉猎、利用《大公报》文艺副刊所提供的背景或资源，但是从未对《大公报》文艺副刊本身作全面系统的梳理，更没有在整体的意义上将《大公报》文艺副刊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独立学术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刘淑玲的这本专著，第一次自觉进入了这个难度很大的课题。作者选择《大公报》最辉煌和鼎盛的时期，即1926年至1949年“新记”《大公报》时期的几个重要文学副刊作为对象，力图通过对这个文学舆论空间系统的考察与论析，动态而历史地展现《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以及两者间的依存互动关系。

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文坛发生重大影响的四大副刊中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先后停刊，《新青年》迁往上海之后，在平津乃至全国文坛中，《大公报》文艺副刊确实成为产生了举足轻重影响的一个文学舆论空间。自吴宓主编的“新记”《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1月2日至1934年1月1日，历时6年，共出刊313期）起，经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杨振声、萧乾先后主编的《文艺副刊》（1933年9月23日至1935年8月25日）、《小公园》（1935年7月4日至8月31日）、由前二者合并而成的《文艺》（1935年9月1日至1949年6月），抗战后增办的《战线》（1937年9月18日至1943年10月31日），抗战胜利后《文艺》之在天津、上海复刊，一直坚持到1949年1月和6月，此外又增加了新的文学副刊《星期文艺》等。历时20年的《大公报》系列文艺副刊，以平津、上海为主要基地，扩展而有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确然如作者所说的，“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发展空间”，“动态地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以此为对象的这部研究论著，则如现代文学“考古”的“田野调查”一样，通过对于原始报刊上诸多繁复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现象的考察，“试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回到《大公报》所展现的时代氛围中，抚去时间的尘埃，触摸它虽然已

经遥远但却依然清晰的足迹，并在对它的寻觅和追问中寻找在这个特定的发展空间中文学的存在方式和意义”。我想，读了这部著作就可以知道，作者的确是很好地实现了这个意图的。

本书以各个时段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经线，以各个历史时段中出现的主要文学现象和问题为纬，分别对于四个时期的《大公报》文学副刊进行了考察与论析，于文学历史现象有许多发现，提出了不少富有创造性的令人感到非常新颖的意见。第一章论述吴宓编辑《文学副刊》时，抓住吴宓“与新文学对话”这一主要思路，不仅很好地理解了吴宓对于中西文学，新旧道理，文言白话之体，浪漫写实各派“毫无畛域之见，偏袒之私，惟美为归，惟真是求，惟善是从”的编辑思想，而且从对新文学的态度、“新人文主义文学观”的阐发、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新文学批评等方面，来看吴宓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文学观的渐趋成熟，以及他对新文学的客观评价。从吴宓借助《文学副刊》这个独特的公众传媒以自己的方式与新文学对话中，可以“更充分了解吴宓的文学观，研究吴宓文学思想的发展，恰如其分地评价吴宓与新文学的关系，它显得比《学衡》更为重要”。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吴宓与新文学关系的独特视角。第二章“文艺副刊”与京派作家群：辉煌的30年代，可能是全书中写得最精彩的部分。作者将引起“京派”与“海派”之争的沈从文在《文艺副刊》1933年10月18日第9期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放在这个副刊创刊时作为主编的沈从文如何历史地展示他的言论立场这个历史背景中，使他持论的语境更加具体化，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沈从文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和含义，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大公报》文艺副刊在20世纪30年代文坛的实际作用。“作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他几乎用整个刊物来向‘白相文人及海派习气’宣战，试图使文学成为一种信仰，一种尊严的事业。沈从文在上面发表的杂论、散文、题记、评论以及与青年作者的通信都是这种信仰的建构。它寄托了沈从文独特而偏执的文学观。”关于《文艺副刊》与现代主义诗潮中的京派诗歌的探讨，以史料的原发性和丰富性，作者论述的锐敏，给我们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一道亮丽的现代主义风景”。《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于《新月》终刊三个月之后，有的研究者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衔接关系，认为1935年11月新辟的《文艺副刊·诗刊》，“实际上是在进行着新月派的探索”。作者通过刊物的理论探讨与创作趋向的认真考察，认为“《大公报》的确可以说是《新月》停刊之后一部分‘新月派诗人’活动的阵地，但是《文艺副刊》的诞生并不是新月派的延续，这些诗人所进行的也不只是‘新月派的探索’”，就《大公报·文艺》的《诗特刊》发表的大量诗歌创作及理论、批评、译介来看，“京派作家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呈现出了现代

性的特征，京派诗人以他们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对人生的独特感受在诗歌领域中体现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性思考”。因为这些论断建立在仔细地翻阅了全部副刊，充分地资料查阅与审慎地归纳分析基础之上，也就比一般批评家的理论论断更为坚实可信了。“从学理意义上来讲，副刊比之任何刊物更具有公众性，它应当是杂语共生，众声喧哗的文学媒体。但是就诗歌而言，我们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却展现了如此众多的同一性，它所凝聚的作者群无论在审美趣味、理论趋向、创作旨意和文学理念上都是如此相通相和。也正是这个原因，它成为30年代影响最大的一个副刊，也使京派诗歌在3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中奏出了强劲而独特的音响。”“围绕着《大公报》的诗人群，大多生活在北平，对现代主义诗潮的接受和融化中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色和古典意趣，‘现代’与‘古典’这一对本是意义上背离的意象，却奇妙地化合在了这一群诗人身上，他们对现代主义诗歌的接受和传播带有自己的独特性，精神上皈依传统，技巧上寻找现代，内容上崇尚古典，形式上探求先锋。当然，并不是说，他们在创作中内容与形式互相分离，相反，正因为二者奇妙的结合，才使得他们的作品展现了独特的魅力。”作者建立在深刻感受基础上关于北平诗人群体的这些精湛论述，应该是符合实际而令人信服的，也是全书中颇为精彩的文字。

《大公报》从《文学副刊》到《文艺》副刊，与现代文学相依相存20多年。它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发展空间，也为20世纪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份无可取代的精神遗产。作者在本书中系统阐述了这个精神遗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作家群体对于文学独立性的强调，作家对于个人身份与文学创作自由性的重视，作家对于文学本体艺术尊严的绝对坚守。由于对文学作为艺术的这一些近于“宗教”的信仰与追求，使他们这个作家群体，“用人性论对抗着阶级论，用个性主义对抗着集体主义，作为文学者，他们最终用创作自由对抗着创作工具论”。（江南：《从“文学”到“文艺”》，2002年4月12日《文汇报》）他们追求政治影响与商品运作之外文学应当获得的永久意义和价值。他们因此而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具有永久魅力的作品。本书以丰实的史料和客观的论述，给我们描绘了这个充满理想与探求精神的文学图景，追踪了他们复杂的心路历程与文学踪迹，通过描绘和触摸这些原初性的精神诉求和丰硕成果，昭示人们努力获得这样的一种富有宽容感的历史认识：“他们和左翼文学为主的主流文学的相互映照和反差，既表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中的复杂性，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丰富性的体现，它的历史存在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领域，同时，在文学史研究中对它给予充分重视，也将可能拓宽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空间，使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资源得以更

加完整的体现。”在对于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的沉思与追问中，作者达到的这种坚实的认识，符合人们所渴望的“建立文艺生态平衡”的理念，其显在的和潜在的精义所传达的令人震撼的信息，远远不止于属于历史，也应该属于今天和永久的未来。

“五四”以来的报纸文艺副刊，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唯一未被全面开发的丰饶的处女地。由于时间的迅捷和受众面的广大，“五四”以来报纸文艺副刊在文学生产与传播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并留下极为丰富的产品。有些作品，有些评论，有些文艺信息，有些编辑的言论，至今尚未得到开掘、发现和认识。一些宏大的理论专著、博士论文，所引述的往往全部都是同行所熟悉的别人用过的材料，即使来自直接阅读的原著，也多依据《全集》、《选集》、《资料汇编》，很少去自己翻阅原始的杂志或报刊，而被引述的不少资源，已经作者修改并非原来的样子了。即使没有修改，全部引用现今出版的《全集》、《选集》、《资料汇编》而不注明原来发表的时间及出处，自己没有一种翻阅原始资料的身经的历史感，资料本身也因为不能给人历史感而减少了论说的分量。我们的学者，甚至在涉猎古代或外国大家的研究专著中，也多引述的是关于论述对象的《研究资料汇编》，而不翻阅资料原始之所出，或依据“汇编”注出原始资料的出处。更多的研究，则重视资料的原初性，下工夫翻阅期刊杂志，努力获得第一手的材料，那代价的付出与收获的喜悦，是别的人所无法理解的。但是，要专门对原始的文学副刊，在做一番彻底翻阅调查的基础上，作出理性的梳理、分析和客观深入的研究，则更是需要付出极大耐心与艰辛劳作的事情了。过去有些学者，已经零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我一直对他们怀有钦佩和敬意。现在，一些年轻人，也开始甘于艰苦和寂寞，进行了这方面的“田野调查”。这部书，就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带有“考古”性的这样一种尝试。其中所钩沉和提供的大量历史现象、文学资料、作家作品、往来讨论、编辑话语，能够给人以鲜活的历史感和极大的新颖性。有许多资料，包括新诗方面的信息，为我过去所未见。即使别处可见的材料，如果翻阅了发表的原始报刊，了解它当时发表的情形，编辑的策略，所处的语境，读者的反应，就会对所用的作品与资料有更深的了解。如孙毓棠的长诗《宝马》，最初发表在1937年4月11日《大公报·文艺》第332期上，题为《宝马——献给闻一多先生》，副刊是空前的以整版篇幅刊出，之前孙毓棠在《文艺》上已经发表了《吐谷图王》、《洪水》等几首以中国历史旧事为题材的诗，长诗《宝马》后有主编萧乾所加的按语：“篇幅实无隙地了，此诗原注只好割爱，我们已请孙先生撰《我怎样写〈宝马〉》一文做此诗更详细的注脚，此外并征集国内诗坛先进对此诗艺术及史乘上的批评。不久将在本刊发表，

敬请注意。”接着在5月16日《文艺·诗特刊》第336期上，发表了冯沅君的《读〈宝马〉》、孙毓棠的《我怎样写〈宝马〉》。冯沅君评之为“史诗”，是“诗中少见的佳作”。这样，就比起根据后来长诗单行本或第二手材料去评价《宝马》，更能对诗的意义价值和当时的影响，有一个立体的鲜活的了解。又如何其芳在《文艺·诗特刊》发表的《论梦中道路》，收在《刻意集》和后来文集、全集时，都改成《梦中道路》，而且删去了很多自认为消沉颓废的文字，特别是删去了“我读着T.S 爱里略特，这古城也便是一片‘荒地’”的一段话，改成“我读着一些现代英美诗人的诗”；他发表在1934年4月18日《大公报·文艺》上的《荒城》，收入《预言》集时改为《夜景（一）》。再如梁宗岱的《新诗底十字路口》一文，如果了解梁宗岱当时被沈从文聘为《文艺·诗特刊》的主编之一，这篇文章就是他在1935年11月8日“诗特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发刊词，对于该文的一些观点的理解和重要性的评鹭，也会与从《诗与真》集子或《全集》中阅读所得，感觉会是大不一样的。这部专著给予我们这方面的启示也是应当珍视的。当然不可能要求很多人来作这样“田野调查”式的现代文学的“考古”工作。但是，将这种重视现代文学报纸副刊和杂志所提供的原生态资料的发掘和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却是所有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应该追求的一种境界，一种修行。如能如此去做，现代文学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化的目标，一些研究者所努力倡导的研究规范“古典化”的希冀，庶几可以接近了。

刘淑玲女史师从郭志刚先生攻读现代文学，并在其指导下花很多精力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经过修改、增补、提升，此论文将作为专著出版，这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的一件好事。我曾参与这篇论文的答辩，并对于这一选题和所做出的富有学术的和现实意义的成果颇感兴味。作者要我为该书写一点意见，我于是放下手边杂事，重读一遍书稿，匆匆中写了上面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姑称之为序吧。

2004年7月7日于北大蓝旗营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吴宓与《文学副刊》：与新文学的对话（1928~1934）	16
第一节 从“办刊宗旨”看吴宓对新文学的态度	16
第二节 “新人文主义文学观”的进一步展开	18
第三节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新文学批评	22
第四节 文学创作：“以新材料入旧格律”	25
第二章 “文艺副刊”与京派作家群：辉煌的 30 年代（1935~1937）	35
第一节 沈从文的文学观与《文艺副刊》的定位 以及“京派”“海派”之争	37
第二节 京派作家对《小公园》的改造 ——由消闲趣味的通俗读物到京派文学阵地	48
第三节 个案研究：《文艺》与书评	65
第四节 《大公报》文艺副刊与 20 世纪 30 年代现代主义诗潮中的京派诗歌	82
第三章 “文艺副刊”与抗战文学：民族战争中的文学选择 （1938~1946）	114
第一节 作家的重聚与《文艺》的改版	114

第二节 京派作家再聚首：抗战中的京派作家群	127
第三节 《战线》与抗战时期的朗诵诗	142
第四节 《大公报》的日本问题研究及其独树一帜的抗战文学	153
第四章 《大公报》的文人立场与京派作家的文学选择	
(1946~1948)	
.....	171
第一节 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学立场	172
第二节 复员后的副刊面貌	178
第三节 自由主义往哪里走?	185
结 语 《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	199
后 记	210

引言

《大公报》是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张大报，它诞生于1902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不仅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而且它自己也经过起起落落，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饱尝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在《大公报》的发展历史中，1926年至1949年的“新记”《大公报》时期，是它最为辉煌和鼎盛的时期，也是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在这23年间，它相继推出了几个重要的文学副刊，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论著就是通过对“新记”《大公报》时期的文学副刊研究来展现《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

一 《大公报》的发展历史及“新记”《大公报》的历史地位

《大公报》的百年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①1902年~1916年为英敛之时期；②1916年~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③1926年~1949年为“新记”《大公报》时期；④1949年至今，为新生时期。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由英敛之创刊于天津。英敛之（1867~1926），生于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名华，字敛之，又号安蹇。幼年家贫，为人军籍得到一份粮饷，自幼学武，20岁左右转为学文，而后博览群书，涉猎甚广，并且愤世嫉俗，尤其痛恨那些“奸贪误国，毫暴虐民”的达观贵人，发誓终身不为官。

《大公报》创刊号上英敛之发表了《大公报序》，开门见山地宣布了“大公”的含义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寄希望于这张报纸能“扩大公无我之怀”，开启民智，富国强民。所以，他在《大公报序》中同时确立了办报宗旨：“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第二天又刊出《大公报出版宣言》，明确表示：“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由此可见，《大公报》创办之初就确立了自己的言论立场：以公正之心来启迪百姓、抨击时弊。事实上，在《大公报》最初的这14年间，也的确发表了很多“敢于抗大官，敢于为民请命”的大胆言论。^①例如在它创刊的第六天——1902年6月21日，就发表文章《论归政之

利》，对慈禧太后的亲信刚毅、荣禄之流进行抨击，矛头直指慈禧，并对袁世凯的求荣告密进行揭露，这种言论在当时的报刊上是罕见的。但是由于英敛之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这时的《大公报》又始终坚持维新改良思想，认为“中国宜先立宪而不宜革命”^④。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袁世凯任了民国总统，英敛之心灰意冷，退出报界，把《大公报》盘给了皖系军阀支持下的王郅隆。

王郅隆（1888~1923）字祝三，天津人，先世为天津著名粮商，本人除经营粮业，兼营木业和盐业，民国成立后兼营金融业和纺织业，一度担任金城银行总董，与皖系军阀关系密切。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召开巴黎和会，《大公报》曾派记者胡政之参加，是到会的唯一中国记者。但是这一时期的《大公报》终因受军阀左右不能独立办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告停刊，停刊号为8315号。

“新记”《大公报》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股把旧日《大公报》盘购而来创办的一张新报。^⑤他们仍然把馆址设在天津日租界旭街原址，为了使读者了解到这是一张具有历史性的报纸，“新记”《大公报》接续旧《大公报》的刊号，把新出版的第一张报纸定为8316号。“新记”《大公报》在天津立足之后，很快把发展的目光投到了北平，并迅速向华北扩展。续刊之初，报纸销售不足两千份，但是在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的带领下，自1928年元旦起，报纸扩充篇幅，每天出10版，9月1日起，每天出12版，销量达1万3千份左右，仅仅用两年时间就使一张关闭的报纸起死回生，从天津走向华北，成为北方的舆论重镇，开始了《大公报》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在中国报刊史上，《大公报》有着独特的地位，而“新记”《大公报》又是《大公报》历史上最具特色的一个时期。

“新记”《大公报》的三位创办人对办报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胡政之和张季鸾，他们在接续《大公报》之前就已经有了多年的报人生涯。

吴鼎昌（1884~1950）生于四川，祖籍浙江吴兴，1903年到日本留学，期间曾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任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民国初年又任农商次长、财政次长、天津造币厂厂长。1922年起出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创办的四行储蓄会主任。1926年，安福系垮台，北洋军阀行将土崩瓦解，吴鼎昌只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基本上是赋闲状态。他出资5万元，用1万元从王郅隆的儿子王景珩手上盘购了旧大公报馆，和胡政之、张季鸾一起组建了“新记”《大公报》公司。

胡政之（1889~1949）四川人，自幼随在皖捐官的父亲生活在安徽，也曾赴日本留学，初入商业专门学校，后研修法科，回国后曾任律师等职，以后对办报情有独钟，于1913年任上海《大共和报》总编辑，并创办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

“新记”《大公报》的人员班底基本上就是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的人员以及原《大公报》的部分职工。

张季鸾（1888~1941）祖籍陕西榆林，生于山东。1900年其父病死山东，他与母亲历经坎坷扶柩回籍，并成为陕西“关学”大师刘古愚的学生。张季鸾也曾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留日期间就曾编辑陕西籍留学生出版的《夏声》杂志。与吴鼎昌、胡政之主编《大公报》之前，张季鸾曾经在上海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工作，后来又在北京与曹成甫创办北京《民立报》，任总编辑。报纸因言论犀利、抨击时政不留情面而激怒袁世凯，张季鸾为此被羁押狱中三个月。出狱后加入胡政之所主持的《大共和报》。虽然为办报受尽磨难，但是张季鸾对“新闻救国”、“言论报国”充满信心。为了保持言论立场的公正性，他主张报人不党，并身体力行，始终以一介书生出现于报坛，并成为一代报业骄子。^④

他们从自己的办报实践中认识到：一份理想的报纸不能从属于任何党派，也不能以赚钱为目的，要站在民间立场上发言，用言论来报国。因而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约定：办报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捐和集资，宁愿把5万元赔光，也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新记”《大公报》由吴鼎昌任社长，张季鸾任总编辑和副总经理，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新记”《大公报》接续了英敛之时期的言论主张，但是他们更强化了文人办报的民间立场，并把它简言之“文人论政”。总经理胡政之曾对“文人论政”的办报方针作过如下精辟概括：

中国素来作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与政治没有关系，且以不问政治为标榜，专从生意经上打算；另一种是政治性的，自然与政治有了联系，为某党某派作宣传，但办报的人并不将报纸本身当作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目的达到了以后，报纸也就跟着衰竭了。但自从我们接办了《大公报》之后，为中国报界开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尤其是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联在一块，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极点。但同时我们把报纸当作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分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之后，使报纸真正代表国民说话。^⑤

在这样一个办报原则之下，续刊之初他们就约定自己筹款，不向任何方面募捐和集资，专心办报，三年之内不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以保证报纸言论的客观性。事实上，在“新记”《大公报》的发展中他们也一直坚守了这个原则，1936年

吴鼎昌到南京任实业部长，就登报辞去了《大公报》社长的职务。“新记”《大公报》不但把“文人论政”作为自己的办报宗旨，而且还把它具体阐述，公诸读者，作为自己立言的依据，也让社会和公众监督，所以续刊日他们就刊出了《大公报续刊辞》和《本社同人之宗旨》，把“文人论政”这一办报宗旨具体化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⑥。

不党：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已耳……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有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任何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公众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诤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这个“四不”方针确立了“新记”《大公报》的发展方向，并使它区别于一切政党所办的报纸，也区别于一般商业性的报纸。

由于政治和商业的原因，在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民营报纸为数极少，最有影响的就是《大公报》、《申报》和《新闻报》。《申报》和《新闻报》是外国商人在中国创办的两家商业性报纸，分别于1909年和1929年回归国人，但是仍然以赢利为主，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商业性报纸的代表。而《大公报》坚持“文人论政”的民间立场，树立了文人办报的典范。

“文人论政”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表明他们要以这张报纸来实现“文章报国”的夙愿，力求站在文人立场上尽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因此，《大公报》非常重视言论的写作，他们在报上开出每天见报的“社评”栏目，对时事社会各个方面论其是非曲直，告诫国人，警策当局，以自己独立的言论立场赢得了各界读者的瞩目。抗战时期，报馆克服重重困难，不惜牺牲营业，抛弃财产，擎起一支秃笔，天南地北，在大后方辗转迁徙、颠沛流离，坚持为抗战呐喊助威，以其坚韧不拔的行动为“文章报国”作了最好的解说。也正是因为这种坚毅的办报精神，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总编辑张季鸾出席庆典致辞时，就把《大公报》所取得的成绩

归因于在商业社会中保持了“文人论政”本色，当天的《大公报》社评《本社同人的声明——关于密苏里赠奖及今天的庆祝会》也表示：“倘若本报尚有渺小价值，就在于虽按照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言论独立，良心泰然。”^④

正因为站在文人立场上对社会发言，使得《大公报》广泛关注新闻之外的文化领域。他们认为报纸的生命首在新闻，但是现代报业还应当承担更为广泛的文化传承的职责，为社会实际服务。所以《大公报》在新闻之外开辟了很多专刊，《大公报》的专刊之中，首重的是文学副刊。他们创办过多种文学副刊，其中最重要的是吴宓主编的《文学副刊》，沈从文、萧乾等人相继主编的《文艺副刊》，《小公园》，《文艺》和《星期文艺》。抗战时期，报馆在大后方颠沛流离，甚至在防空洞中印报，纸张缺乏，版面缩减，很多专刊都已停办，在这种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不但支持《文艺》继续出刊，而且还增加了专为抗战而设立的另一个文学副刊《战线》。所以《大公报》自始至终都把文学副刊看作是报纸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设立充裕的文学版面，支持文学创作，奖励文学新人。

1936年《大公报》馆设立了“《大公报》文艺奖金”，这个奖金的评选契机虽然是庆祝《大公报》续刊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但是其根本原因是基于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认识。“九一八”之后，日本对我国不断进逼，从建立伪“满州国”到华北特殊化，这个时候，是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公报》一方面提醒国人警惕日本军阀的侵略野心，在社评和新闻中加强对国内国际局势的报道；一方面告诫社会在“团结奋斗，为国牺牲”的大前提之下，也不应轻视青年人的人格塑造，他们认为文学的休养能够帮助青年人培育自己独立刚健的人格：“必有以丰其感情，浚其智慧，解其苦闷，增其勇敢，使之对自己能解决人生之归趋，对人类能发济度之宏愿，然后中国得集中其全体青年之热血热泪，以上自救救人之途，是则文学的修养尚矣。”^⑤正是出于对文学的这种认识，他们看到由于政治争端和商业因素的影响，文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因而把倡导“刚健自由之时代文学”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们说，“乃社会既不尊重文士，即出版界之于文学，亦每以商品目之”，“吾侪报人，不事文学，于新文艺尤为门外汉，然能认识文学与国民生活关系之重要，故以为有尊重奖励文学艺术之必需”。1937年5月15日，“文艺奖金”评选揭晓之后，《大公报》专门发表社评把这一观点详加阐述：“最近数年来之中国文艺界则似反不如十数年前之生气蓬勃。盖党治之下，顾虑仍多，外患方张，人心忧郁，积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原因，随使文艺界不能如初期之明朗进展。吾人尝概念我一般青年文士，处拜金之都会，为商品之卖文，生计压迫之，法禁拘束

之，修养读书，无此暇时，旅行考察，无此余裕，其见闻思索所及，将欲大声疾呼，以批判人生，箴规社会，而又动辄得咎，不得畅所欲言。于是不得已而转为苦闷的呻吟，或阴郁的讽刺，不然，则随俗浮沉，聊以投市肆之所好。十年以来，几许有望之作家，如此消磨，甚或抑郁摧残以毁其生命焉。夫吾人不否认文艺界有病态也，但以为病态之由来，则社会与政治负责，不应由一般之青年文人负责，盖中国政治上与社会上，实尚遗留旧时代之不少病根，需要廓清，且当前更有不少社会问题，需要解决，此正需要刚健自由之时代文学，暴露而批判之，使全国公私各界之精神生活，能与时进步，不忘反省。是则文艺之自由保护，尚矣。”^②

因此，对《大公报》馆来说“文艺奖金”的评选不只是一项纪念活动，它蕴涵了这些报人对文学的根本态度。这次评选活动汇集了文坛上的众多名家，成功地评选出何其芳的《画梦录》、芦焚的《谷》和曹禺的《日出》为“文艺奖金”获得者，扩大了他们的文学影响，这是《大公报》运用报纸新闻这种强有力的传播手段对文学活动最为有力的一次扶植。

这种“文人论政”的舆论空间使得一些与政治相对疏离、又不愿与商业结缘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它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他们在这一独特的文学空间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建构理想的文学蓝图。沈从文和萧乾等京派作家还根据自己的文学理念改造了虽然读者众多，但是却与新文学发展不相适应的通俗性栏目《小公园》。总经理胡政之曾经鼓励萧乾说“我们不靠这副刊卖报，你也不必学许多势力编辑，专在名流上着眼，你多留意新的没人理睬的。只要从长远上，我们能对中国文化有一点点推动力，那就够了。”^③

《大公报》诞生于天津，天津在当时是租界林立的工商城市，而张季鸾和胡政之知道报纸要在商贾之间坚守“文人”本色，谋求长远发展，就必须广泛借助社会力量，因为他们认识到“一个报馆无论拥有多少专家，绝对不如社会多，报纸不论消息怎样灵通，消息却来自社会；一张报纸的得失，全凭运用社会力量的大小，把新闻事业公诸大众，比把持新闻事业不能开创好得多。把社会力量融合于报纸，才构成舆论，报馆本身无舆论”^④，“舆论之锻炼，赖于知识之集中”^⑤。所以，依托平、津大学的文化资源，提升报纸的文化品位，在多种文化领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是他们逐渐形成的办报理念。他们邀请北大、清华、燕京、南开各大学教授编辑专刊、撰写星期论文，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氛围。

因而《大公报》副刊的编者很少有报馆的职业编辑，大都是这些行业的专家学者，文学副刊的编者更是如此，吴宓、杨振声、沈从文、陈纪滢^⑥等人都是报馆之外的学者或作家。而《大公报》的总编辑总是把“自己隐藏在后面”，给编者充分